

孔子研究论文集



目 录

孔子讨论会报导	新华社 (1)
孔子思想述略	金景芳 (1)
毛泽东同志对孔子的评论	骆承烈 (16)
孔子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发展和他的 政治观点	于成武 (23)
孔子与曲阜	孔繁银 (34)
浅谈孔子的时代及其政治思想	徐志详 (40)
试论孔子“仁”的含义和阶级性	孙开太 (53)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礼”不是“仁”	郭克煜 (63)
“季氏八佾舞于庭”新释	李启谦 (72)
试论孔子的理想社会	周炳荣 (77)
析“吾道一以贯之”	沈茂骏 (88)
孔夫子与秦始皇	朱 活 (102)
孔子与封建政治	孔令彬 (112)
论孔子天命观的自然本质与伦理意义	赵吉惠 (122)
《易传》的思想及其派别	祝瑞开 (140)
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方法论问题	周德昌 (150)
孔子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	杨天堂 (162)
试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赵本乾 (171)
试论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问题	迟克俭 (175)

- 孔子“有教无类”刍议 徐喜辰 (184)
“有教无类”辨 陈汉才 (191)
孔子的人才学和人材教育思想 陶愚川 (202)
谈《论语》中孔门的师生关系 商松石 (223)
试谈孔子爱的教育 张如珍 (230)
孔子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再探 李国榕 (242)
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 燕国材 (262)
论孔子的师范教育 卢兼三 (288)
孔子“举一反三”说辨析 郭令吾 (295)
为“学而优则仕”辩白 王永贞 (303)
孔子想思与中国礼俗 吕启明 (308)
孔子的文艺思想初探 陈之任 张玉声 (309)
孔子与《诗经》 李凌 (318)
《论语》伪章辩证举例 李毅夫 (329)
孟轲思想初探 王轩 (336)
曲阜纪游 严北溟 (343)

曲阜举行孔子讨论会

新华社济南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山东曲阜学师范院最近举行孔子讨论会，来自十三个省市的六十多个单位计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

会上收到六十篇论文，有四十多人发言。这些论文和发言从孔子的时代背景、阶级属性、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方面各抒己见，展开了自由讨论。大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孔子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办教育经验中的一些积极成分，仍可作为今日教育的借鉴。

与会人员倡议成立“孔子学术研究会”，并欢迎台湾省和海外研究孔子的学者参加这一研究活动。

(原载1980年11月22日《光明日报》)

孔子思想述略

吉林大学 金景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其先世自宋迁来。

本为殷后，子姓，孔是其氏。父叔梁纥为鲁陬邑大夫。《左传》襄公十年有“陬人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又称“襄（同陬）人之子。”①司马迁作《史记》，特为孔子作世家，称为“至圣”，足见推崇之至。

孔子自称“吾少也贱。”②他在年轻的时候，曾作过“委吏”和“乘田”③等小职员。后来由中都宰升为司空，由司空为司寇，与闻国政。以不得行其志，离开鲁国，周游卫、宋、郑、陈、蔡诸国。晚年归鲁，专心从事著述和教育事业。卒年七十三。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兹着重从哲学、教育和历史观三个方面谈谈孔子的思想。

首先谈孔子的哲学思想。

谈孔子的哲学思想，我认为，第一应和《周易》哲学联系起来看；第二应对孔子所使用的天命和中庸这两个概念有正确的理解。

《论语·子罕》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又《公冶长》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证明孔子平日很少谈到天命的问题。但是今日保存在《论语》一书中，却可以看到多处涉及天命问题的材料。

例如《为政》说：“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季氏》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都是正式地谈天命的。

其余，有时单谈天。例如《阳货》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信，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宪

问》说：“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八佾》说：“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雍也》说：“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有时单谈命。例如《雍也》说：“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宪问》说：“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尧曰》说：“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由于孔子关于天命的观点并没有作过专题论述，而只是见于只言片语，偶而涉及，所以最容易被人歪曲。然而把全部材料综合起来，细心考察，其意义是可以确切地知道的。《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两句话，是对孔子所使用的天命概念的正确的解释。“莫之为而为”，说明天的客观性；“莫之致而至”，说明命的必然性。把天命二字连结在一起，就是指自然发展规律而言。在这里边没有鬼神和上帝存在的余地。有人说孔子是宿命论者，这种说法不对，因为一个宿命论者，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孔子则不然。他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④“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⑤怎能说是宿命论者呢？

正由于天是自然，命是自然的发展规律，才有一个知天命的问题。命是自然的发展规律，才有一个知天命的问题。特别是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假如说天是上帝，命是一个宿命论的命，那么孔子自述学习进程，为什么只是说活

到五十岁的时候才知天命呢？这岂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吗？

“特别是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把四时行、百物生作为天的行动表现来看待，则孔子所说的天命，不是自然发展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联系《周易》哲学来看，可以看到《周易》里《乾》卦是象天，无亨利贞是象春夏秋冬四时。《系辞传》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以至于筮法之有“分而为二，以象两，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这些言论，归纳到一点，不就是“天何言哉”这一段话的另一种说法吗？又《蛊卦》彖传说：“终则有始，天行也。”《剥卦》彖传说：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系辞传》说：“是以明于天之道。”这里所说的“天行”、“天之道”，不是自然发展规律是什么呢？

事实上，孔子所说的天命或天道，和老子所说的天道是一种东西，都是指自然发展规律而言。所不同的是，老子的观点是道生一、一生二”，而孔子的观点只是一生二，没有道生一。《易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个太极就是一，两仪就是二。“太极生两仪”，就是一生二。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一是第一性的。老子认为道是第一性的，——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一是什么呢？是有，是物质。而道是无，不是物质，是规律。《老子说》“天下万

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是这一观点的最确切的表述。所以，老子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孔子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今人为了适应批孔的需要，硬说老子是唯物论者，孔子是唯心论者，完全不顾客观事实，亦可怪矣！

孔子的哲学思想不但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这也是醉心于批孔的人所最不愿意了解的一件事。

《论语·微子》记孔子在评论伯夷、叔齐、虞仲诸人之后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万章下》着重阐述孔子的这一观点，说：“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提出这个时字，真正抓住了孔子思想中一个本质特点。《论语·为政》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又《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又《先进》说：“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游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上述这些事例，证明孔子在生活实践中真正能够按照“无可无不可”这一思想行事。这个“无可无不可”思想，是反形而上学的。它是遇事都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

处理。孔子是圣之时，正表现在这些方面。

其余如《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和。”这个“不失人亦不失言”和“和而不同”，里边都包括有辩证法思想。此类言论尚多，就不在这里费词分析了。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⑥孔子把中庸思想看得最高，认为中庸是人处身行事的最高准则。中庸是什么意思呢？近人多认为中庸是折衷主义，是调和。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自今日始。《后汉书·胡广传》称引当时的谚语已有“天下中庸有胡公”，即把中庸看成是调和。朱熹作《皇极辨》，指责当时诸儒把中庸说成“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当做的事，只略做些，不要做尽。”所有这类把中庸解释成折中调和，含糊苟且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论语·先进》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反对过和不及，正表明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用烹调作比喻，过是过火，不及是欠火。过火不好、欠火当然也不好，最好是既不过火，也不欠火，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就是中庸。用党的政策作比喻，过，好比“左”，不及，好比右。“左”不好，右也不好，最好是正确贯彻执行。这个正确贯彻执行，就是中庸。这样，中庸怎能说成是折衷主义，说成是调和呢？折衷主义这个概念是指无原则地机械地把各种不同的思潮、观点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样，它怎能同孔子所说的中庸并为

一谈呢？

《论语·阳货》说：“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子路》说：“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什么是“乡原”？为什么说：“乡原德之贼也”？这个问题，《孟子·尽心下》有详细的说明。他说：“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俗也，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孟子刻划乡原，可谓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然而人们却偏要把孔子所崇尚的中庸说成是他所讨厌的乡原，真是咄咄怪事。

孔子所崇尚的中庸，同孟子所说的“孔子圣之时也”两种说法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都是辩证法的思想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礼记·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正是时与中思想的一致性的证明。

其次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⑦的口号。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⑧“束脩”是古人见面所用的一种最薄的礼物。也就是说，

无论是谁，只要肯来求教，他就进行教育。根据长期的教学经验，他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⑨“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⑩“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⑪

孔子善于因材施教。例如上文已经说过的，他对一些人的问孝，问仁，问政等等，都针对不同的对象作不同的回答。他经常对弟子作调查研究，了解到每一个人的特点。例如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喟。”^⑫“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⑬

孔子早已实行启发式教学。例如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⑭

孔子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⑮对弟子则循循善诱。颜子曾谈过他在孔子座前受教育时的亲身感受，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⑯

孔子重视对学思、言行、质文、新故等一些对立面的处理。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⑲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⑳“质胜文则野，文胜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㉑“告诸往而知来者。”^㉒

孔子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例如《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个意、必、固、我，正是主观主义的几种表现形式。

孔子对知与不知，一贯持老实态度，从来不不懂装懂。例

如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㉓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㉔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㉕

孔子认为求学应当刻苦。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㉖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㉗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㉘他称赞颜子的贫而乐，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㉙

孔子的弟子分为四科。《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认为一个人学成致用，需要经过四个阶段。《论语·子罕》说：“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自述为学进程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㉚所谈内容与上述阶段基本相同。“可与共学”和“有志于学”同属第一阶段，即开始学习的阶段。“可与适道”为第二阶段，是选定正确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孔子自述中包括在第一阶段的“有志”里。“可与立”和“而立”为第三阶段，是志向坚定不可动摇的阶段。“可与权”和“不惑”为第四阶段。什么是权呢？《孟子·离娄上》有一段话解释得最好。它说：“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立“如果说是处常，要求有原则性；“权”则是处变，要求

有灵活性。权的本义是秤锤。秤锤必须随时移动，然后才能称量的物重相平衡。光懂得原则性，不懂得灵活性、是处理不好事情的。《孟子·尽心下》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对无权的害处也解释得很好。实际上，懂得权就是懂得辩证法。

孔子自述作学问的态度，于《论语·述而》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于《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公冶长》说：“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足见孔子毕生好学，老而弥笃，不以死生异其志。只有这样才能成一个好老师。

关于孔子教育目的，无可否认，他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但是，从他的教育方法、教育态度来看，虽至今日，也有许多可取的地方。特别是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和实践，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付卿相，小者发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子教育的影响于此可以概见。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不是虚美，而是有

事实根据的。

必须指出，孔子贵仁与墨子贵兼爱有本质上不同。兼爱是主张爱无差等，而仁则主张爱有差等。因此孔子言仁，总是以合礼与否作为具体的标准。例如《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为政》说：“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又《八佾》说，“定公问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事君以礼，人以为谄也。”又《学而》说：“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些事例都说明孔子言仁，其具体标准就是复礼。不但对任何人都要依礼去做，即便是一个人的视、听、言、动，也都要依礼去做。看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这确不是一句空话。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谈到义的地方也不少。例如《里仁》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卫灵公》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为政》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述而》说：“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卫灵公》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都是。

关于仁义礼三者的本义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样解释，是非常正确的。用今日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仁是爱，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有等级的爱；义是宜，它是以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等级的宜；至于礼，则是以仁义二者为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仁义礼作为道德来说，正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复杂情况。

关于一般的道德修养，孔子着重注意下列一些问题。

《论语·宪问》说：“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又《季氏》说：“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又说：“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又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辞，损矣。’”

又说：“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又说：“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

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孔子观人很注意实践。例如《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又《公冶长》说：“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最后谈孔子的历史观。

孔子的历史观是唯心的，这是没有疑义的。尽管他在“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③1}，在“颜渊问为邦”时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③2}但这只是指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内部有变革有批判继承的问题来说的，并不说明他已意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会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事实上他所说的损益，并没有超出奴隶社会的框框。他认为奴隶社会是永恒的，是万古不变的。因此，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或“道不行”，这个“道”不是别的，就是周道；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或“礼以行之”，这个“礼”也不是别的，就是周礼。孔子生当春秋末世，那本来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末日，是奴隶主阶级的末日，而他竟荒谬地把它看成是世界的末日，全人类的末日。孔子一生留下许多言论，许多事迹。如果从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从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一句话，就是企图使车轮倒转，倒转到西周，即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③3}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③4}充分证明孔子一生向往的是西周，心目中所最崇拜的人物是周公。

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孔子的政治企图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孔子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作《春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全部地在《春秋》一书中反映出来。司马迁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⑤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成者其惟’《春秋》乎？”^⑥二人所说的，正是这个问题。

孔子之所以这样看当世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有阶级根源。我看这样说法不一定对。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贱”从孔子的阶级出身说，比卫鞅、韩非要低得多。为什么卫鞅、韩非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法家，而孔子却成为拉历史倒退的儒家呢？有人说，由于孔子是宋后或殷后。这种说法尤为荒唐，不自觉地已陷入反动的血统论的泥坑。我们今天确实重视阶级成分，但是怎样能用十几世或几十世以前的祖先作为确定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根据呢？据我看，孔子是陬人紇之子。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生活环境同他的思想形成，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毕生总是同古打交道，久而久之，他的眼睛遂被这个古给蒙住了，终于成为古的俘虏。三国时“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⑦后世儒生俗士不识时务，正是受了孔子的影响。这是儒家的传统使然。可以说，儒家之祖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知古而不知今，不识时务的人。

然而，孔子这个人物，不管怎么看，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末，对于孔子应当怎